

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现*

——访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杨生平教授

本刊记者

杨生平，男，1965年11月生，江苏盐城人，先后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人的发展专业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曾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和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出版《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包括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期刊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其中有6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10余项科研课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与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三等奖等奖项。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等。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①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围绕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第二个结合”的意义，本刊专访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杨生平教授。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与意义研究”（22ZA003）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扬斗争精神应对风险挑战研究”（23LLMLA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一、文化意义的全面凸显和文化的广泛作用

▲（采访者简称▲，下同）：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能否请您具体谈一下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首先，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纵观当今世界发展，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文化不仅有引领社会发展和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作用，还对经济与政治等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已不完全限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一种直接作用。从经济方面看，虽然它从根本上服从物质发展规律，但像勤劳、节约、奋斗和信任等基本文化价值观无疑已成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正如当代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因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①不仅如此，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渐渐被纳入商品生产的轨道，在出现文化产业的同时，还使众多实体经济或实体商品注入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文化经济”现象（文化经济中的“文化”已不是一种间接经济力，而成了直接经济力）。从政治方面看，尽管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肆扩张，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像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等一些西方学者鼓吹的那样已经“终结”。如果说这一斗争还在当今世界宏观政治领域（当然也渗透到中观与微观领域）持久进行的话，那么，随着全球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与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西方社会的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文化在当今世界政治中观与微观领域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增强。一方面不同国家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现代政治核心概念有着不同的文化解读，另一方面因像民族、种族和性别等问题的文化介入出现了特定的“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斗争”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对这些现象的一种反映。事实上，与其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当今世界范围文明关系的一种反映的话，还不如说它更是对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政治状况的一种反映。当然，文化的意义与作用还体现在当今社会整体建设与发展中的社会、精神与生态等诸多领域。

其次，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增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理论，此时人们的需求逐步从物质需要转化为精神需要，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这方面需求。另外，随着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和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入，在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以提炼和总结像睦邻友好、和善天下等价值观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化软实力不是一种征服力，而是一种吸引力和向心力。只有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内和国际价值观，才可能在赢得别人尊重的同时顺利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助推国际秩序朝着合理的发展方向。

最后，文化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支撑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因素。文化对民族和民族发

^① [美]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展的意义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纽带与灵魂。民族是靠文化支撑与维系的，民族文化既能提供强大的民族精神，也能提供强大的民族智慧。可民族精神的维护与民族关系的维系是需要悉心呵护的，这在当前世界文明交流、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民族精神的维护与民族关系的维系自然可以通过教育、学习与交流来传承，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们融入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建设。另一方面，尽管民族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规律，但文化对民族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无疑有着关键性作用。民族历史上就存在，但现代“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却是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①。当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从文化视角剖析了现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他说：“民族归属，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个字眼，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② 20世纪初，中国渐渐开始实现由传统“文明”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传统国家是根据儒家思想确立的“天道”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天道”实际上是将儒家人伦日用客观化的结果。因儒家思想具有一定超越时空的价值，故而不少思想家将它称为一种文明，即儒家文明或中华文明。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特定民族独立与自由为前提。因现代“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发明且建立了配套的政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必须破解一些特殊的难题，以防其中的陷阱。根据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他们认为，为了确保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即“一民族一国家”。而我国的民族却有着与他们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实情。我国56个民族虽然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但经过长期的交往与交融，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一套独特的政治与学术话语体系和政治措施，巩固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以防止西方“西化”和“分化”的阴谋。

▲：您主要从三方面讲了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作用。文化如此重要，它对我们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上述论述只是分析了文化影响的几个重要领域，并没有囊括文化影响的全部。事实上，文化影响的范围比这里论述的还要广泛。文化如此重要且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实际上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它要求学者要用更宽、更广和更深的视野考察和剖析文化问题。纵观目前国内外国文化研究现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文化”的定义就不下于200种。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思路，文化人类学家的相关成果可以拓展和深化文化问题研究。因为，他们的研究不仅仅立足于理论层面，更多了不少田野调查。这样就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内在机理。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给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 在泰勒看来，文化渗透于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特别是生活方式之中，不仅包括系统的观念形态，还包括不系统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根据他和其他人类学家的思想，可以把文化分成四个层面：物质领域的文化（即物质文化）、制度领域的文化（即制度文化）、行为领域的文化（即行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文化（即精神文化）。这四个领域中的文化不是平行关系，其中，精神文化规定并制约着其他三个层面文化的性质与发展，而后者对前者也有一定的反作用。

二、现代化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选择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文化与文化资源既是我们能够充分文化自信的根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不过，在分析这些文化和文化资源具体作用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是的。这即文化作用的“条件性”与“制约性”问题。尽管文化人类学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但也遭到不少批评。其令人诟病之处就是将文化看成无所不包的大全，从而找不到把握文化内在规律的切口。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就曾指出：“由于文化概念被用来包罗除了人的身体的与生理的特点以外的人类生活中‘变化的’万物，它成了和人类学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化人类学’本身）同样广阔了。这个概念说得好是含糊不清，说得不好是累赘重复；无论如何，它冒着丧失其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其学术资格的那种精确性的危险。”^③ 在此，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L. A. 怀特提出了突破性思路。他说：“文化学也意味着决定论。正如在我们关于宇宙的经验领域中处处起作用一样，因果律也在文化现象的领域中发挥功能。任何给定的文化情境都是由其他文化事件决定的。如果某种文化因素起作用，则必会导致某种后果。反之，无论我们如何虔诚地祈求发生某种文化成果，除非提供出为该成果所要求的因素，并使之发生作用，否则它们便不能实现。”^④ 他将文化区分三个层次，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认为技术系统的文化规定并制约着社会系统文化与思想意识系统文化的变化与发展。L. A. 怀特这一思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它为人们把握文化内在发展规律提供了启迪。跟其他文化人类学家将精神文化当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的决定力量不同，L. A. 怀特将以技术系统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当成社会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决定性力量。这无疑向唯物史观迈进了一步。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看来，L. A. 怀特这一思想还是有局限的，它仍然是在文化之内寻找文化变化发展的根源，未能真正找到文化变化发展的根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根因必须到文化之外的“劳动”以及对“劳动”的分析中寻觅。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明确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

①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③ [英] 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④ [美]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1页。

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虽然技术系统的变化发展跟文化有关，但归根结底它还是由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因为，正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才使科技发明、科技创造和科技应用有了可能与实现空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可以助推科技发明、科技创造和科技应用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清楚说明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文化上的发明与发现在其中相应的作用^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不仅规定和影响特定社会不同领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还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与发展。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对社会总体及各领域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过分夸大这种作用，更不能导致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应该在生产方式及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化发展中考察文化的具体作用。在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当时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在叙述历史时过分夸大文化作用的“文化史”思想的批判，对于我们辩证吸收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相关文化思想是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③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呢？

●：现代化发源于西方，是西方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与以往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是有较大优越性的制度，它在产生后的几百年内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渗透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现代化渐渐成为一种世界浪潮。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西方化”还是不少国家与地区作为实现现代化而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末“本土化”和“多元化”则逐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大趋势。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一定优势的制度，但其难以克服的矛盾注定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完成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与科学思想^④。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新制度，它给人类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根本保证。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一元的，即资本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排他性关系，选择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反之亦然。尽管当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互相学习与互相借鉴，但其根本制度的差异决定它们不可能最终趋同。

现代化的本质是一元的，但现代化的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要弄清楚其中的道理，就必须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谈起。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与世俗化等社会发展过程；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历史与哲学概念，它不仅指明“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而且还确定了其内在规定与内在特征。从它们的关系来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与运行机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外在表征及其发展过程。现代性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又都分为宏观现代性与微观现代性两种形式。就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来说，其宏观现代性是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9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413页。

上的私有制、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和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其微观现代性是经济上的资本与科技结合、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结合以及文化上的主体与理性结合。一般西方学者将经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统称为社会现代性，并与文化现代性相区别。社会主义社会宏观现代性包括经济上的公有制、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和意识形态上的集体主义，微观现代性包括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政治上的民主与法治以及文化上的集体主体与实践理性。

文化现代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就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来说，文化现代性既起着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辩护的目的，又起着为其发展输入精神动力的功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从形成开始就有一个自我确证性问题，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向人们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否则就无法得到人民认同因而影响其顺利发展。为此，资产阶级思想家打出了“主体”与“理性”两面大旗，并以此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证。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完全新型社会，因为它是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人”主要是个人）的社会取代以“神”为中心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前提，并通过“理性”设计出的一套制度体系，而封建社会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神”的存在基础之上（即封建社会是以“神”的存在为前提而确立的一套制度体系）。不但如此，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还渗透到包括经济、政治和精神等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分别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现代性、政治文化现代性与精神文化现代性等，从而助推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与各领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性一开始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逐步暴露，其内部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分化加大，个人片面发展问题严重，社会各领域也由以前的彼此基本协调逐步发展为相互制约，甚至还出现经济与政治力量逐步向文化与生活领域渗透的情况，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日常生活殖民化”现象（即日常生活出现严重异化现象）。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也由以前弘扬的“主体”原则与“理性”精神走向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反主体”与“反理性”思想，出现了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的明显自反性。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如今的资本主义仍然是有一定生命力的，虽然在发展中矛盾不断出现，但资本主义总是想方设法缓和这些矛盾（加之他们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利因素与成功经验）。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虽然一开始很明确与稳定，但其矛盾不断产生与缓和的过程决定着其现代性不得处于流变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的流变性决定着“多元现代性”与“多元现代化”的产生。因为，不同国家与地区（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同特点与矛盾性质，结合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此，以色列社会学家 S. N. 艾森斯塔特曾提出：“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假定，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① 他这种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因为，文化现代性在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早期文化现代性过分强调个体主体与工具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之间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能用一种缓和它们彼此矛盾关系的文化思想去指导社会发展，那自然有可能探索出一条走向成功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道路。但 S. N. 艾森斯塔特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不是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文化方案都能成功探索出一条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只有那些根本符合现代性精神及其矛盾解决思路的文化方案才有可能做到；另一方面，现代性与现代化成功方案可不完全是由文化方案决定的（尽管文化方案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

^① [以色列]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页。

更是一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行为。

▲：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如何解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大致说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经过了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阶段，经过不断摸索，从科技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思想文化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基本上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设想来建设现代化的（即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客观上说，这一时期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宏观制度。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后来邓小平指出的“发展太慢”与“贫穷”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就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GDP增长量比较而言的。若与旧中国相比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长速度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近40年还是飞速发展的40年。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中国自1949年到196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异常惊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非他国所能媲美。就连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未能超过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计划经济是一门不仅为更早时期苏联的经验展现出来，而且为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证明的手段。”^①当然，问题出现的根源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没有用好社会主义这个好的制度。于是，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就是在不断探索与建立完善现代化新路的40多年。不过，中国没有像苏联和东欧那样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实际和国情，大胆借鉴与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困苦的摸索过程。尽管其中有挫折，但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基本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坚持社会主义宏观现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在微观现代性方面作出综合创新，将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融入其中，具体表现为：经济现代性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现代性上的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建立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起来。“第一个结合”更多是服从客观规律的过程（因为，“第一结合”强调的“实际”主要是以物质特性为根本的具体实际，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等），“第二个结合”则更多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的过程。“第一个结合”规定和制约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对“第一个结合”有能动的反作用。“两个结合”之间的这一关系亦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论述中得到清楚说明^②。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完全取决于它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更取决于它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这个客观历史条件具备，那它相关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也会在“跨越”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若不具备客观历史条件，光凭后者是无法成功实现“跨越”的。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曾明确指出：“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三、“第二个结合”的意义

▲：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文化现代性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在这一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文化现代性与现代性文化（以下简称现代文化）也是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文化现代性更强调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规定性，而现代文化则是指体现并融合了文化现代性精神后形成的整体性文化。它们的联系在于，文化现代性形成后总要通过现代文化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而现代文化也只有体现文化现代性精神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现代文化。一些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也可能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但它们并不符合文化现代性精神要求，那么，这类文化就不能算上真正的现代文化。尽管从历史短时段看它们对社会的发展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稳定或推动作用，但从历史长时段看它们必然会阻碍社会整体发展，因而最终被历史淘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既要注重文化现代性精神建构，又要注重现代文化建设；既要重视总体性的现代文化建设，又要重视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与生活方式文化在内的各领域现代文化建设。这里的现代文化既包括新文化，又包括从传统转化而来的文化，当然也包括从国外学习来的先进经验与科学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自然要把重心放在坚持并创新体现文化现代性精神的先进文化上，事实上创新文化也存在“第二个结合”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它体现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在此过程中利用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做好“第二个结合”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做好“第二个结合”，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只有精华性的文化才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发展。所以，对传统文化要做的首项工作就是对其认真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精华与糟粕不是能从传统文化自身中简单区分出来的，必须有衡量标准。这个标准自然就是文化现代性精神。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文化现代性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文化，自然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优秀内容与优秀成分，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另外，尽管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个体主体性与理性精神的内容，却包括大量能解决西方现代化弊端的独特观点与独特主张。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同于西方因主张主一客二分而带来的生态平衡破坏，中华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同于西方因重视个人主义而导致的人际关系淡薄，中华文化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整体主义；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不同于西方因片面重视工具理性而导致的物质主义，中华文化强调身心和谐和精神人格^①。这些优秀内容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宝贵资源，做好“第二个结合”无疑能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增添无穷的精神力量。

▲：那么，请您具体讲讲“第二个结合”的意义所在。

●：第一，“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任何新事物要顺利发展就必须得到人民的广泛认

^① 参见杨生平：《文化自信的意义及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同，以增强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节约社会成本、增强社会资本自然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如果新事物得到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可以减少社会转型时需要付出的成本，还可以增强社会资本。关于社会资本，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曾这样说过：“社会资本的定義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便得以彼此合作。如果这个群体的成员能期待其他成员的行为可靠和诚实，他们就能彼此信任对方。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①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上的价值取向一致，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文化基础。“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第二，“第二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正如上文所说，文化渗透于社会一切领域，在这个文化凸显的时代，既要做好总体与重点领域的文化建设，又要做好各领域文化的全面建设。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做好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突出优势，它不只是以丰富的文化资源，更是以整体式的文明篇章，开启了人们广阔的理论 and 实践创新空间。如：社会治理方面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个人行为与人格方面的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思维方法与日常交往方面的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以及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等。就法治方面来说，中华文化也有着丰富的思想与经验。法治思想自然应该体现文化现代性精神，维护人们正当权利与社会正义，但也要跟国情与民情相结合。“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思想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对推进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各有其独立作用，但道德作用更加广泛，应该将道德与法律统一起来，实现彼此的互动，一方面以法律强化道德建设，另一方面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礼记·乐记》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现代法治精神应该是“良法善治”，只有“礼乐刑政”共治，才能达到其效果。荀子云：“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礼主别异”，即不同人有不同礼的要求与规范，而“乐”又将区分开来的人结合为一个和谐整体，因为“乐主和同”。这种“礼乐”治理方式正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需要认真总结与继承的东西。

第三，“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跟文化现代性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样，文化也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的独立性与独特性，是不同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它既是不同民族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与基础，又是不同民族维系自身关系的基石与纽带。文化主体性往往通过特定民族的独特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主体等综合体体现出来。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思路相似，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德”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文化强调的“德”不仅仅限于人际关系，更是“民胞物与”的“大德”。《周易·文言传》曰：“夫大者，与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

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乾文言》）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传统儒家的“内圣”开不出民主与法治的“外王”，但经过“第二个结合”后传统儒家“德”的思想得到了丰富与充实，这样既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又可以实现“新内圣”助“外王”的目的^①。尽管传统儒家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以顺应自然、等级社会以及个人牺牲物质利益后产生的和谐，若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充实其中，就可以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实现天人合一，在自由民主法治和国强民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物质与精神都满足并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迈进的人与自身的和谐。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大德”。

第四，“第二个结合”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经过“第二个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所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②。

四、以科学精神做好“第二个结合”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好“第二个结合”呢？

●：首先，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精神，以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做到在实践基础上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现代化，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大胆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只是一个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与文化行为和过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就是需要大力弘扬主体性原则与理性精神。市场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契约行为，而“契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市场经济自然需要集体主体的力量和价值理性的作用，但更需要激发个体主体的潜力与活力以及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但如上文所述，由于资本主义过分依赖个体主体作用与工具理性价值，导致了社会各领域关系失调以及人的片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应是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以及人的物质与精神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注重集体主体与价值理性的价值与作用。但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过分重视后者又会导致效率下降。由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与建构的文化主体性精神就应该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由于中国式现代化不同发展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就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关系作出调整，保持它们之间动态的、历史的平衡与统一。

① 《礼记·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传统儒家的“修身”不能直接达到现代齐家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可以助力产生协商民主与调解法治等思路与思想。另外，“格物、致知”的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后，可以演绎为一种中国式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追求。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其次，以“两相”（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依据遴选与甄别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表面上看，文化现代性精神主要涉及政治领域中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问题，事实上它涉及社会所有领域。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依靠人”和“为了人”。社会所有财富都是由“人”创造的，创造这些财富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与发展。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政治自由与平等之外，还需要经济条件、社会关爱以及精神人格。因此，就需要社会各领域分工合作创造条件，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与发展。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重点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需要，政治领域的发展主要是保证人的自由与平等，社会领域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公正正义与人的团结关爱，文化领域的发展主要是解决人的精神需要与精神发展，等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各领域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遴选与甄别传统文化不仅要考虑到与现代文化相适应，还要同时考虑到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再次，以“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原则丰富与建构社会主义总体及不同领域的现代文化，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等，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整体与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它们之间往往不是点对点的关系，更是点与线或点与面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表现为一种整体式的文化关系，这对于我们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十分有益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与农业文明，加之文化之间关系联系很紧密，因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成了一项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的工作。如，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就往往跟封建社会的盛世相连，“民本”往往跟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相关，孟子就曾提出过“保民而王”的思想，“法制”实质上是一种“人治”，等等。针对这一情况，就必须对遴选出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并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创新，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与内涵。要通过“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最后，必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地从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经过“两相”和“两创”的过程而导致的某种复古或食古不化倾向；二是将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与历史上其他复兴（或复古）运动简单等同起来。中外历史上都有过复兴运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跟它们有着本质区别。以往的文化复兴往往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或满足某部分人或某些集团的利益和目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为了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赓续中华文明和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编辑：张晓敏）